

宋代學術思想研究

金中樞 著



多利亞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金中樞著

宋代學術思想研究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四號

著者：金 中 樞

出版者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校對：伍明清・熊珍珍

發行人：李 鍾 桂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三樓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號

印刷者：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基本定價：六元六角七分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出版

目次

緒論

第一章 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上）……………一七

第一節 聶崇義的三禮圖學……………一七

第二節 王昭素、柳仲塗、胡周父、附黃敏求等的經學……………五六

第三節 崔頤正、邢叔明、附杜文周、孫宗古、馮道宗等的經學……………七三

第二章 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下）……………九五

第四節 种明逸、穆伯長、李挺之、黃景微等的經學……………九五

第五節 王聖源、宋貫之、何濟川、周子餘、龍起之等的經學……………一二〇

第六節 賈子明的經學……………一四四

第三章 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一八一

第一節 柳仲塗等於宋初承五季駢文取士時期之古文運動……………一八三

第二節 穆伯長等於景德以後西崑時文取士時期之古文運動……………一九七

第三節 石守道與景祐以後之古文變體……………二一一

第四節 歐陽文忠與慶歷以後之古文運動……………二一九

第五節 餘論……………二二三

第四章 宋代學術發展之轉關——胡安定（上）……………二五五

第一節 就一般文獻及與胡著有關人員來分析……………二五五

（一）從撥棄文辭而提倡體用之學……………二五五

（二）從體用之學而開創理學之端……………二六五

第二節 就胡氏專著及與胡著有關著述來分析（上）……………二七八

（三）從撥注疏、尚經義而開理學之端（1）……………二八〇

（四）從撥注疏、尚經義而開理學之端（2）……………二九〇

第五章 宋代學術發展之轉關——胡安定(下)……………三〇一

第三節 就胡氏專著及與胡著有關著述來分析(中)……………三〇一

(五) 從撥注疏、尚經義而開理學之端(3)……………三〇一

(六) 從撥注疏、尚經義而開理學之端(4)……………三一四

第四節 就胡氏專著及與胡著有關著述來分析(下)……………三二二

(七) 從天地之道(天地之性)到君臣之道……………三二二

(八) 從聖賢之性(天地之性)到常人之性……………三三三

第六章 車蓋亭詩案研究……………三四五

第一節 車蓋亭詩案之起因與神宗建儲……………三四五

第二節 車蓋亭詩案之實質與郝等故事……………三六一

第三節 車蓋亭詩案之後果與劉文書獄……………三八七

附 元祐黨人與其緣詩案所受處置概況表……………四〇九

第七章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上)——因素……………四二五

第八章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中）

——措施

第一節 朝廷及朝士對於方術之迷信或利用（上）——劉、郭、二王時代·····	四二五
第二節 朝廷及朝士對於方術之迷信或利用（下）——林靈素時代·····	四四一
第三節 方士與朝士之互相結納及其謀反——卽張懷素事件·····	四六五

第九章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下）

——影響

第四節 建宮觀、賜道號、鑄九鼎·····	四八三
第五節 教義之宣揚·····	五一六
第六節 抑釋以揚道·····	五三四
第七節 揚道以濟儒·····	五五六
第八節 作萬歲山·····	五七七
第九節 設花石綱·····	五八五
第十節 置應奉司·····	六〇二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下）——影響·····	五七七

緒論

宋代的學術思想，自國初以來，即沿著兩條路線發展：一條是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另一條是撥棄時文（駢文）而提倡古文。先從科舉考試來論證，此拙著北宋科舉制度研究裏說過：「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至眞宗咸平五年，洛陽節度判官張知白深以此爲不是，乃上疏難之，……不徒說明當時之風尙與弊害，而此後各科試藝、習業之重心，蓋亦循之轉變。……自咸平、景德以後，（一）關於習業者，由重經、史、子、集而趨於重經、史，而習經亦由重注疏而趨於重大義。（二）關於試藝者，由重詩、賦而趨於重論、策，而試文亦由重聲律而趨於重治道。」再具體言之：「景德二年，……試進士，題爲『當仁不讓於師』，不取賈邊『解師爲眾』之新說，猶仍以注疏爲本。……迨『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遂開以意說經之端。……劉敞『七經小傳出，……稍尙新奇。』……而科場以意說經之風，遂不可抑止。……此不僅考生如此，其時朝廷詔令，考官問目，亦莫不以是爲準則。宋王珪所謂『悉以明六經大法之歸，固不專于記誦之功』者，此也。……故

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案宋儒撥棄傳注，遂不難於議經。排繫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觀、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集謂晁說之。此皆慶歷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使然。』……則熙寧王氏父子著三經新義以取士，又何怪焉！……此所謂『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準是以觀，知當時朝野雙方大都撥棄傳注和時文（駢文），而提倡經義和古文了；可見這兩條路線之發展，是當時學術思想的必然趨勢。

今拙著第一、二兩章，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上、下，即其第一路線的論證——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

其第一節「聶崇義的三禮圖學」，首先揭發此義。其要說：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就是經學之變古。此當趙宋開國之初，甚至在她以前，已經萌芽，聶崇義即其代表人物。他博采先儒三禮圖，凡得鄭玄等六家。他據此六家所采的古典，也就是經義；不合乎經義的，就以理論合事實裁定之。禮其本也，圖其末也。「惟聖人務其本以求理，存其末以致用，故能通天下之變，而至於道也。」它的內容，自冕服圖至目錄，一共二十篇，謂之新定三禮圖；行世之後，一方面廣被採用，另一方面則廣受批評。然宋史將他列諸儒林之首，可謂極儒生稽古之榮了。禮圖之近乎古者，莫過於這部書。若拿理學家的觀點來衡量，則猶以為不及。故宋代經學之變古，即經學當代化，雖一器之微，亦必返斯世於

三代，以跨駕漢唐。此亦見經學與理學之所由分了。

其第二節是王昭素、柳仲塗（開）、胡周父（旦）及黃敏求等的經學：自宋初聶崇義創新三禮圖學以來，其爲開風氣之先驅的代表人物，則是他們。就王氏言，從少年開始，卽立志很高，好學不疲，爲人不苟，而不願做官。其學博通九經，對於莊子和老子也有研究，特別是易經。他認爲魏、王弼和晉、韓康伯的注及唐、孔穎達等疏周易、都不一定是對的，所以著易論三十三篇；對漢唐以來的注疏，已經發生懷疑，甚至加以否定，而開「撥棄傳注」的先河。此於古爲通經致用，於今可謂開經學當代化的先聲。其次，言柳氏。他有開創學術新風氣的勇氣，不但完全拋棄了注疏，而且要實行以儒家爲傳統的經學；基於這種立場，去繼承文中子的續經工作，而從事補經。故宋代經學當代化，卽經學之變古，柳氏實開風氣之先驅，像他「開有宋之新文運」是一樣的。又次，言胡氏。他極聰明，有辯才，也有大志，雙目失明以後，還令人讀經給他聽，未嘗有間。他著漢春秋，切侔聖作；又著演聖通論六十卷，包括易、書、詩、禮記、春秋、論語等六部書，不惟校正五經，且有創見。故他於宋代經學之變古，亦是開風氣的一員，也就是希望經學當代化。最後，言黃氏。他通經術，「摭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著九經餘義一百卷，計四百九十餘篇，有創說或微言。其書又經皇上以下的高級官員之推薦和評審，且云「甚有可採」，可見他也是開風氣之先驅的一員。

其第三節爲崔頤正、邢叔明（曷）、杜文周（鎬）、孫宗古（爽）及馮道宗（元）等的經學：他們是上述王昭素等同時及其以後一批經筵派的經學家，對經學當代化，卽經學之變古，都有開創之

功。就崔氏言，他是「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的經學家，而不是過去的「專經之士」，或視章句爲經學之流。他刊正經義，任國子監直講及經筵講官，有倡言經義的功勞，故經學地位很高。其次，言邢氏。他的經學地位，比崔氏高得多。他崇尚經義，有很多例證：一、用「羣經發題」；二、「發明君臣父子之道」；三、「校定九經疏義」，並大量發行；四、依照經義推行行政令；五、以經義警戒災異；六、講經多引時事證明；七、頗受眞宗對經注懷疑的影響；八、他的論語正義可謂爲漢宋二學的橋梁。故邢氏不僅是經學當代化的創始人，而且是其中重要人物。又次，言杜氏。他博通經史，經義進對深合上意，終始不衰，可惜變古不純，脫離不了讖緯。故他的經學地位，既不如上述崔、邢之流，更不如下述孫氏和馮氏了。再言孫氏。他不同於杜鎬，甚至比邢氏的地位還要高。他的經學極爲精湛，認爲講經學之重大義，其影響於當時，遠非傳注可比。他明經之體而達其用，反對迷信的讖緯之學，並以爲老佛二氏都不如儒，故專誠推行儒家的經術，合其「進孟子音義序」而觀之，不難概見他的尊王與明道及反釋老的構思，而與後來胡安定（瑗）、孫明復（復）和石守道（介）等的思想相頡頏，豈惟「有功典籍」而已耶？故他一生奮鬥，長達六十餘年，可謂開經學當代化之先驅的重要人物。最後，言馮氏。他的經學僅次於孫氏，然而他是開創經學當代化的中堅人物。讀宋祁所撰馮侍講行狀，即可證明。他從學習和研議以至講學，都以發揮經義爲前提，既身體而力行之，又影響於當時，並亦反對佛道二教。總之，他崇尚傳統的禮，有時變得太多，而有過分之處，「不如夷之折衷也。」

其第四節是种明逸（放）、穆伯長（修）、李挺之（之才）及黃景微（晞）等的經學：繼經筵派的經學家而爲經學當代化之先驅的人，還有他們幾位。种氏博通經史，力反浮屠，所著蒙書、嗣禹說、表孟子和時議諸篇，都是依傍經義來發明，有列聖行道的作用。穆氏受易於种氏，而以聖人爲師，不事章句之學，所著詩文，必求合經旨，以趨於大道，使民棄佛從聖，而有他的「古文運動」之功。李氏師穆氏，始於春秋，終於易理，故其經學立場，與理學相近。劉義叟從李氏受曆法，亦可謂經學的緒餘。黃氏長於禮學，其易理和春秋學不及同時諸大儒；然而是一位有所建樹的經學家，也是有所爲、有所不爲的君子，有論著可資證明。

其第五節是王聖源（沿）、宋貫之（咸）、何濟川（涉）、周子餘（堯卿）及龍起之（昌期）等的經學：他們這幾位，也都是經學當代化有貢獻的人。王氏治春秋，撥棄傳注，而箋以己見，並以其斷時事焉。他的唐志，即本春秋之意而作，而更用心於當時。宋氏師孔子，著有易補注、易訓、易辨和論語增注諸書。他的易學，上追古聖人，以致其用，迷信一掃而空，大爲歐陽修所稱賞。何氏著有春秋本旨等書，所至多建學館，教誨諸生，尤其對當時抗敵諸將發揮了功能。周氏之學，不惑注疏，詩重義理，春秋重左氏，以窮理推尊孟子，以盡性推尊中庸，對禮經更能身體而力行之。龍氏博貫諸經，有很多著述，韓琦、文彥博諸宰臣均稱之，朝廷亦予以表揚，且列爲范仲淹的門下；可惜他變古不純，而走極端，以致違古、背經而傷道了。

其第六節是賈子明（昌朝）的經學：他繼經筵學派而起，積官至宰相，並帶「觀文殿大學士」之

職的榮銜。他講經學是偏重大義的立場，能收「通經致用」的效果，也就是經學當代化，故他的經學地位很高。此從他以大義講易和春秋學，與夫史稱：「其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觀文殿大學士，皆仁宗爲公特置之，」首先得到證明。其次，拿他的著作來衡量。其第一部著作春秋要論，使他獲得「直集賢院」之職，可見它的價值也很高。其第二部著作春秋節解，所解的是春秋精義，而不是章句之學。以上二書，均經遺失，其迄今具存的巨著是羣經音辨。此書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秋三傳，暨孝經、論語、爾雅，凡七卷五門：一、卷一至卷五辨字同音異；二、卷六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卷七辨字訓得失；雖云辨字、辨音，卻開經學當代化的先聲，對後來經學有很大的影響、貢獻和價值。尤其是最後「辨字訓得失」一門，四庫提要謂爲「附辨」，所辨的只有九個字，「既本字法，爰及經義，從而敷暢，」大大地發揮了經學功能，不獨能代表全書，且知其重經義的強度和深度。附辨如此，其正辨不言可知。

以上六節，共論二十人之多，都是「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的人，足證它的發展，的確是一條康莊大道。

此下第三章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即其第二路線的論證——撥棄時文（駢文）而提倡古文。就這一方而言，即上述「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一線索，初亦得自此說。它經過以下諸進程：一、柳仲塗等於宋初承五季駢文取士時期之古文運動，二、穆伯長等於景德以後西崑時文取士時期之古文運動，三、石守道與景祐以後之古文變體，四、歐陽文忠與慶歷以後之古文運動，五、餘論。此五

進程，即爲五節。其第四節裏有云：「歐公論文，一本韓公，而並亦與理學家相近，……從事古文運動，或可謂爲折衷『時』、『變』二體之運動。故廬陵劉性序宛陵先生年譜云：『宋嘉祐二年，詔修取士法，務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爲試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其實梅聖俞早與李泰伯從事於古文矣；……『慶歷間，……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聖俞對於詩之復古，爲功尤大。而蘇曾諸氏又皆先後爲歐公門下士，……曾氏實爲之冠。……又史稱：『王安石、介甫，……爲文動筆如飛，』……『友生曾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此慶歷二年事也。故臨川王氏尤先蘇氏而爲歐公之門人。此子瞻所謂『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者也。……『自是臨川以王氏爲宗，南豐以曾氏爲重，眉山以蘇氏爲師。』……『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尙已。』……古文運動，至此告成。

上述「餘論」，即論證古文道學化。這樣說來，亦足見此一路線之發展，也的確是一條康莊大道。

何況古文是「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和「文以行道」，而六經都是載道、明道和行道的書，則此兩條路線之發展，應可殊途而同歸；然欲開創新說，其轉關必有賴於大儒了。同時，上述張用晦嘗云：「今夫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亂皇王之大道也。」^②這是宋朝士大夫，在學術上正式要求統一，而提倡「春秋大一統」（同上）的開端；

其目的則在「尊王」與「明道」，而為當代學術的兩骨幹。故「昌言師道，確立道統，」尤非大儒不為功。由是言之，當首推胡瑗、安定其人焉。

安定對宋代學術發展的轉關作用，即在其「推陳出新」，下分四五兩章來說明。提要言之：如前所述，宋代學術之發展，在胡瑗、安定之先，經過許多學人努力奮鬥，一方面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另一方面撥棄時文（駢文）而提倡古文，雙管齊下，並對釋老二氏思想加以批評，而鋪平了轉關的大道。等到安定出來，「昌言師道，確立道統，」纔正式轉關。^⑤

先就一般文獻及與胡氏有關人員來分析：（1）從撥棄文辭而提倡體用之學。他「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而講學為文，都撥棄注疏，發明經義，使經學當代化和義理化。故呂大中說：「自胡海陵之學，經義、治事各名其齋，而天下始知有體用之學。」（2）從體用之學而開創理學之端。此進讀呂說，即可證明。再看他主持太學，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頤所試文，謂顏子「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異之。今考其來源，主要是中庸、論語、孟子、易經和大學，此正是後來理學的根基。又次，看陳亮「三先生論事錄序」，知程頤的「心性學」比胡氏另一門人顧臨的「治平學」佔了上風。此中消長，即新法前後的政治趨勢使然，亦經學理學之所由分。故黃東發說：「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先生而始。」

其次，就胡氏專著及與胡著有關著述來分析：其說易以義理為宗，說洪範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故他的著述，可以三言概括：（1）撥注疏之非，（2）發經學之覆，（3）開理學之端，今舉例述

之：

如周易口義釋「乾」，「言人當法天之健用」。釋「元亨利貞」，謂爲「乾之四德，配之四時五常而言。」是「聖人備于乾之下，以極天地之道，而盡人事之理也。」這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或「物我合一」之思想，與注疏不同，而爲程傳所取資。是經學從漢學轉變到宋學，現在逐步哲學化，而爲理學開端。

又如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謂「上合天心，下順人情，然後可使一民不失其所，一物必遂其性；」和同篇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之義，謂「萬物各遂其性，一民一物無不遂其性。」像這樣的說，全書很多。則胡氏開理學之端，此其鐵證。

又如釋「利貞者，性情也」之義，謂仁、義、禮、智、信五常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爲情，聖人性其情，而天下得其利，小人情其性，則不保其身。程朱一承其說，則胡義爲其轉關，是可以肯定的了。

又如釋「師」卦象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之義，與注疏大不同，謂「行險而順」，「必須順于物理，協于民心，」分「民心」與「物理」爲二，一變而爲程頤的「性即是理」，復變爲朱子的「吾心」與「物理」之分，則胡義開理學之端，這不又是鐵證嗎？

又如釋「同人」，……「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的義，亦與注疏大不同，實在是他自己的理想和措施，也就是經學當代化，而程傳則一變而爲理學。今置表如下：

胡 義	程 傳
天下莫不欲安、……欲壽、……欲富、……欲逸。 君子之道（扶而不危，生而不傷，厚而不困，節其力而不盡。） 君子推其仁義之道、忠恕之德，以及天下。 君子盡心，無所不同，故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之志萬殊。 理則一也。 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 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通於理而已。

照這樣的比較，大略相同；而所異的，就是經學理學之所由分。何況伊川語錄也說：「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又說：「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更說：「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語錄與傳說同，而傳說承自胡義，是胡義開理學之端的又一鐵證。

又如釋「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之義，完全撥棄注疏，而發明經義，謂「聖人」、「賢人」和「賢人而下」的性都是善的；獨「賢人而下」，即程頤所謂「途人」，其「情欲之發，有邪有正，故於心術思慮不能無所汨。」後來程頤說：「性無不善」。又說：「心本善」，「發於思慮」的「情、才、氣」，則「有善有不善」。二說的異同：安定言「天性之全」，伊川一變而為